

中原作家文丛

邢

军纪

XINGJUNJI

报告文学自选集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中原作家文丛

邢军纪
XINGJUNJI

报告文学自选集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邢军纪报告文学自选集/邢军纪著.-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11

(中原作家文丛/杨贵才,孙鑫亭主编)

ISBN 7-80623-115-3

I.邢… II.邢… III.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8561 号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4.875
字数 345000 印数 1—4000册
定价 19.7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邢军纪

XINGJUNJI

笔名沉钟，祖籍河南临颖。1969年入伍，华中师大文学硕士，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军事文学教研室主任。自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500万字。三次获全国文学大奖，两次获全军新作品一等奖。曾被收入1994年《中国人物年鉴》，英国剑桥《国际名人录》第24版。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

《中原作家文丛》 编委会

主 任	林炎志	
总策划	刘海程	
编 委	林炎志	刘海程
	邓本章	田中禾
	杨贵才	孙鑫亭
主 编	杨贵才	孙鑫亭

巴蜀问答

——与梁多亮先生谈报告文学创作(代自序)

邢军纪

梁多亮:我是四川省宜宾师专中文系教授,宜宾师专报副主编。由我申报的科研课题《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论稿》已经四川省教委批准为四川省普通高校文科重点科研项目,并被出版社正式纳入 1997 年出版计划。我在该书的《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论》专章里,将论述我国 12—15 名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拟将您列入其中。请您结合自己创作实际,回答下列问题。

您能否谈谈您为什么主要选择报告文学创作?您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在何年何月何种报刊?已发表的作品中,您最喜欢您的哪一篇或哪一本报告文学作品?为什么?

邢军纪:不是我选择了报告文学,而是报告文学选择了我。我曾经写过诗,写过散文和小说,后来才写起了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我文学创作活动中开展最晚的一种形式。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在 1983 年《百花园》杂志第八期,题目叫《来自东方的使者》,是写援外人员如何保持中国气节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就被《报刊文摘》转载,并被上海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同时还被《百花园》杂志社评为优秀作品奖。当时它确实对我有所鼓舞。但我并没有打

算继续搞报告文学。我那时仍主要从事小说创作。直到1987年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之后,我才主要从事报告文学创作。

我是这样考虑的:

一、时下是报告文学时代。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种全方位的复苏和跃动,为报告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广阔的前景。报告文学是社会最直接的晴雨表。唯有它才能最直接、最快速、最敏锐地反映时代生活。新时期的开拓不论在内容方面还是在创作手法上都是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它的繁荣景象是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上所不曾有的,正像徐迟先生所说:“它的领地越来越大,读者越来越多。一切证明我们这个时代,可以是报告文学的时代了。”

二、可以借此了解中国国情。就个人生活阅历而言,我原本很简单。小时候上学,16岁参军,以后一直在部队生活。这种单向度的生活,确实很妨碍人的视野,由于对社会缺乏深入全面地了解,看问题往往很片面,写文章就不免肤浅和偏颇。报告文学创作以来,我写了许多人,涉猎过陌生的领域。由于报告文学的性质决定,必须要进行深入细致的采访,掌握丰富的材料,这样,我就通过采访了解了许多原来不懂或者陌生的东西。比如我写过《1988·明星大走穴》(长篇报告文学),就明晰了文艺界的现状;写过《中国税收之战》(长篇),就洞悉了偷税漏税的情况;写过《文物大走私》(长篇),就知晓了神秘而充满文化魅力的文物王国;写过《黄河大决口》(长篇),就知道了抗日战争的许多秘闻;写过《商战在郑州》(长篇),就懂得了市场经济对每个城市乃至中国的意义;写过《北中国的太阳》(长篇),就明白了环境保护和植树造林的重要性;写过《百



年沧桑》(长篇),就清楚了香港割让的原委如近代史;写过《锦州之恋》(长篇)和《公仆》及《雪山之子》,对孔繁森、张明岐、赵松祥等人的精神世界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寻觅之后,就对共产党人的本质有了全新的认识……我还写过几十部中篇报告文学,它们都是在认真采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就像一个个横断面,它们经过我精细地用眼去观察,用心去触摸之后,又连接一起,最后使我对当下的中国有了较为整体的认知。它也大大丰富了我的知识面,开拓了我的视野,同时也帮助了我的文学。即使我现在不从事报告文学创作,而去从事虚构的艺术——写小说,我自认为也比先前好了许多。

基于以上原委,所以我说是报告文学选择了我。

这就是我主要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原因。

在我发表的作品中,我比较喜欢的是两部得奖作品,一是获1991年—1992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的《疯狂的盗墓者》(中篇),二是获首届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优秀作品奖的《商战在郑州》。前者多有神秘色彩,惊险、刺激,又富有文化内涵;后者视点较峻,纵横捭阖,张弛相宜,且走且唱。它们基本上代表了我的创作风格。因此我比较喜欢。

梁:您的生活道路对创作道路有哪些影响?

邢:我的生活道路可以说分为两部分。一是16岁之前的童年生活或少年生活,二是16岁之后的军营生活。这两部分生活都对我的创作给予了很大的影响。童年生活给了我民族的血脉,它使我根须深扎在民族的土壤中,这种多年滋养孕育的情愫和爱祖国爱人民爱家乡的情结深埋在我心中,并在我长大成人之后通过作

品发表出来。军营生活对我而言就是政治生活或是社会生活。如果童年生活带有较多的自然属性,而军营生活就带有较多的社会属性。它是因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谁都知道军队是武装的政治集团这样的话。它是有纪律的、有规范的、有约束力的。它们同样给我以深刻的影响。我身上同时生长着这两样东西。有时它们交替作用我的创作道路,有时又能互相融合协同。它们既是独立的、矛盾的,又是可以统一的。多年来,我就是这样乐此不疲地调解和谐着它们,同时也这样烛照着自己的创作道路。

梁:您认为报告文学的审美特征是什么?

邢:报告文学的审美特征似乎是流体。它具有流变性、时间性、迁徙性。通常来说,时下好的报告文学应该具备这样的特征:如时代性、思想性、真实性、文学性、知识性等等。但在假话盛行的年代,只要敢于说出真相,它就是美的、有思想的、有时代意义的。所以说,报告文学的审美特征是随时代而变化的,不是固定不变的。

梁:请您谈谈作家的人格力量、艺术良心、社会责任感对报告文学写作的重要性。

邢:这三种因素是作品的骨骼和灵魂。散漫于社会间的真知和美好像雾像雨又像风,它们通过作家才能凝聚和表达。作家是一个中介物,但这中介物并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动的。作家的人格力量越强,社会责任感越重,他就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越关心,对人民的冷暖疾苦越关注,对人世间的真善美越亲近,对丑恶污秽的东西越仇恨。

就我所知,报告文学作家大都是社会责任感颇重的人。和其



他文学门类的作家相比,他们更直面人生、更关注现实、也更需要勇气。有人说,报告文学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样式,这话我颇有体会。如果当年我们不去河南洛阳孟津乡下一个叫“鬼沟”的地方夜窥盗墓,不和盗窃贼“打成一片”,就不可能写出《疯狂的盗墓者》这样的得奖作品。如果女作家张玲不冒着生命危险去追踪伪气功大师,就不会撕下张小平的外衣……

梁:您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如何处理报告性、文学性和理性批判?如何体现艺术真实的?

邢:报告性也可以称之为新闻性或时代性,因为它必须具备新闻性、热点性、社会性和群众性。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人们总有一个共同的话题,有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有一个集体的兴奋点,这个东西就叫报告性,它具备报告价值。这也是一部报告文学首先具备的条件。但仅有报告性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强烈的文学色彩,有深刻的思想和理性精神笼罩它。

如果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那么,报告文学就是写实的艺术。什么叫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呢?茅盾先生曾说:“‘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件事立即报告给读者大众。题材即是发生的某一件事,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的形象化。……好的‘报告’需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等等。”这些话后来就成了一些人解释阐述何为报告文学文学性最权威最便捷最可靠的论述。我个人认为,茅盾先生的论述固然不错,但仍显得具象狭窄了一些。报告文学乃是调动一切文学手段使其更真实的艺术,因此,它不仅仅局限借用小说手法,还可以借用影视、诗

歌、散文等手段去丰满和完成它。它的原则是真实。为了这个真实,应该运用一切文学手段去尝试一下。

关于理性批判,它似乎是报告文学的力必多,是类似雄性激素的一种东西,也是人类智慧的表现,它在报告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理性批判实际上是宽泛的,是泛指。它是报告文学的脊椎和力量的源泉。

报告性、文学性和理性批判是构成报告文学的三大要素,缺一不可。它的处理过程妙不可言,简单概括起来就是要使其具备大的报告价值、激烈的文学色彩、深刻的理性精神。这些因素的具备初步构成了一部较好的报告文学作品。

前面我似乎已经谈到了艺术真实的问题。在以真实为原则的前提下,调动一切文学手段,使其接近事物的本质,经过这样处理的就是艺术真实。它既反映了事物的原貌,又和原来的事物不同,它更精彩、更形象、更生动,因此也更真实。

梁:您是如何选择题材的?题材的大小对报告文学的价值有无太大的影响?

邢:这些年,我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普通老百姓,就像一个农夫守望田畴,像一个天文学家守望天体,像一个地震工作者观察异常活动的山峦,山体升高或者陷落,我都注意观察和记录。凡是老百姓感兴趣或引起关注的,或是利益攸关的,都是我的选择题材,只是有的来不及做罢了。我以为题材大小对报告文学的价值没什么大的影响。

梁:您能阐述一下您的创作风格吗?或您是否在有意培养您的创作风格?



邢：我以为目下国内有两种类型的报告文学作家，一是记者型的；二是作家型的。记者型的报告文学作家能及时捕捉热点，作品具有很强的新闻性、时效性以及很大的轰动性效应。作家型的报告文学作家在选择题材方面不仅仅着眼于它的新闻性，更侧重它的文学性和哲理性。我认为我的创作风格更接近后者。当一个题材确定之后，我考虑更多的是两个问题：文学性和思想性。文学性因素是：我该怎样表现它，怎样把它变成艺术品，怎样选择角度，怎样刻画人物，怎样描写事件，怎样运用语言等等；思想性的因素是：我该怎样把握它，怎样使作品具备有一定的认识价值或给人以启示。怎样使作品充满力度，怎样给作品一个有力的支撑点等等。我所追求的是作品要有浓郁的文化感和厚重的历史感，有极强的文学性和哲理性、思想性。

梁：您以为创作报告文学最难的是什么？

邢：说真话。

梁：您怎样看待市场经济体制下，报告文学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如何预测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发展趋势？

邢：市场经济为报告文学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搭设了一个铺天盖地的大舞台。报告文学的题材面大大拓展，一些蛰伏多年的领域得到了复苏，一些原本没有的东西也得到了新雨的催生，长得郁郁葱葱，几近乱花迷眼的地步。这是报告文学大发展的时机，同时也存在着新的挑战。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量新生事物丛生，使人四顾茫然。比如高科技领域，如信息高速公路，如单性克隆绵羊复制等等，如果不深入其中，如果不用这方面的知识，您就很难有发言权。二是价值观念发生偏移错位甚

至倒置,使人莫衷一是。比如年前到一村落采访,问及现在姑娘择偶标准是什么,答曰:第一等是劳改犯……问为什么,答有安全感,别人不敢惹……姑娘们说,没人再把老实忠厚放在选择的首位了,因为这样的人没能耐。虽然这只是个别地区或个别现象,但其中却蕴含很多很复杂的内容,值得人们深思。三是报告文学一哄而上,有商业趋势。随着经济发展,工商社会的山峦日渐隆起,报告文学作者寻访探胜者越来越多,于是就出现许多有偿文学、广告文学、企业文学等等,其中主要是报告文学在担任主角。由于伴随着经济利益和有偿关系,报告文学特有的批判锋芒被减弱了,报告文学的声誉被损坏了……

当然,不利于报告文学发展的因素还有许多,因时间关系就不详奉告了。

关于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前景,我认为是乐观的。它很可能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最卓有成就的文学模式。它有着光荣的过去和现在,必然有一个光荣的未来。

1997年1月

目 录

巴蜀问答

——与梁多亮先生谈报告文学创作(代自序) (1)

商战在郑州 (1)

公仆 (88)

疯狂的盗墓者

——文物系列报告文学之一 (145)

都市之魂 (197)

锦州之恋 (304)

雪山之子 (394)

后记 (463)

附:邢军纪主要获奖作品年表 (465)



商战在郑州

战争是商业竞争的一部分，
也是人类兴趣和行动的冲突。
——卡尔·冯·克劳斯威茨

楔子：一张彩票落在商鼎上

这是只巨大的商鼎。鼎呈方斗形，通高五米，直口，深腹，平底，口沿如唇，距方鼎不远处纹有一尊人像立柱，饕餮纹身，各色人等。从高空俯瞰，很像城市伸出的手臂。

当城市预期在飞机的轰鸣声中颤抖的时候，据说，在万张彩票如落英缤纷而下时，最早承接那些印有“亚细亚商场”字样彩票的，就是这只可以称之为郑州手臂的人像立柱和那只巨大的商鼎。

这只商鼎的原形，就是市内不远处的张寨南街杜岭土岗下发现的，因而文物界称它为“杜岭一号铜鼎”。著名雕塑家吴树华按原型放大五倍矗立在郑州人民路和太康路交叉的三角公园。商鼎和人像柱落坐的地点选择得无可挑剔，它正是三千五百年前商朝国都——傲都城墙的南端。

夏代时,商族还是居住在黄河中下游的一支弱小部落。由于夏禹主张“懋迁有无”,重视贸易,因而部落生机勃勃,终于在商汤时灭了夏,建立了商王国。

后来商王朝被周武王所灭,按照战胜者必须保存战败者祭祀的惯例,周武王封殷纣王之子武庚为原来商地的诸侯,故曰商邱。西周初年,武庚反周失败,商地遗民大批被周公旦迁至洛阳。失去家园的商民只得重操旧业,赶着牛车四处奔走叫卖,周人称他们为“商人”,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叫“商业”,所买卖的货物叫“商品”。他们从东方来,把东方沿海的盐鱼等商品拿到西方卖,因此就叫“卖东西”。因他们过去居住的傲都是商朝的中央都市,因此而称“中国”。中国这个称谓就是从商朝开始的,因此,人们也叫他们为“中国商人”。

站在郑州这个三角公园似乎特别能感受历史,这是通向历史的神秘出口。遥想傲都当年时节,身为“天下之中”九州“赋入贡渠”,各路“懋迁”大军,他们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舆,云云拥拥,风风火火,好不热闹!那时的繁华虽已乘风归去,却亦如雨露滋润过中华民族……

1992年春节,在河南省考古界一位朋友指引下,笔者曾沿着昔日的傲都(已不复存在)绕城一周。这是一次具有非凡意义的造访,它使笔者意外发现了许多东西,感觉到了一种令人震惊的神秘力量。

我们从国际饭店起步,沿着边长1700米左右的长度走出了个7公里长的“口”字。在“口”字合拢的时候,我们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在这个三千五百多年前的商都,这个曾经叫“中国”的地方,这个产生商人的摇篮,它的四周最适合贸易的部位,如今矗立着五家本市最负盛名的商场。它们依次是:紫荆山商场,郑州市

百货大楼,商城大厦,华联商厦,亚细亚商场。加上市西郊的商业大厦,被人们统称为六大商场。

本文所叙述的便是六大商场的故事。

因此,当这座城市自有了这组商鼎与人像纪念碑后,就像一道神秘谜语的答案,一下解读出城市的灵魂。这座城市三千五百多年的日月精华,全被它凝聚而去,它又像“芝麻芝麻开门吧”那样能打开财富之门的咒语,深刻影响着城市的发育。它为城市规定了个性、品格特征,具有神秘不可测的把握力量。它是城市的象征,是一枚闪闪发光的城市的徽章,它就别在城市的胸前。

1992年5月6日,当郑州亚细亚商场利用场庆活动,又一次把旷日持久闻名全国的郑州商城从地面引到空中时,让中原航空公司的Z24运输机引擎的轰鸣声将郑州市民赶到户外去享受阳光时,机组人员按照亚细亚商场的指令,进行低空盘旋,让商品经济的声音充斥郑州的上空;同时也让这高频振荡敲击它的对手,那就是商城、华联、郑百、紫荆山、商业大厦等五大商场联谊会的老总们。机上人员从一定的高度辨认着被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的城市和那些在商战中仍频频交火打得难分难解的商场时,不禁感慨万千。仅仅几年工夫,郑州便不敢相认。她在商业竞争中走出了泥泞,一个大商业、大市场、大流通的格局已经形成,整个城市发展的脉络像机翼下的黄河,清晰可辨,一个辉煌的宏大的构思——要把郑州变成全国商贸中心城市的设想正在实现。城市已不复相认,唯有那个城市的徽章——商鼎以及那只城市高扬的手臂还能寻踪。在诸多观感和浮想联翩中,他们把万张彩票朝着城市的胸膛抛撒下去……